

福音運動與時代轉變：

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由 1957 到 1997 發展路線及對時代的回應

劉國偉/總幹事

前言

本文嘗試鳥瞰香港基督徒學生團契，由 1957 至 1997 四十年間的事工路向，重點放於當時事工的發展路線，而並非機構整體人和事的歷史敘述，旨在鋪陳其事工如何緊扣於時代脈搏，並塑造出緊貼時代而反省神學的信仰氣質。

緣起（1957 至 1961）

香港基督徒學生團契(FES)的事工可追溯至 1957 年。最早成立的事工組織，分別是畢業生團契（GCF）、福音閱覽室（ERR）及中學生團契（ISCF）。當時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（IFES）遠東區第一任總幹事艾得理牧師（David Adeney）於 1956 年抵港，積極聯絡大學生及畢業生，分享傳福音的異象。

FES 的中學生福音工作，始於 1956 年 IFES 亞洲區巡迴幹事黃群健（Gwen Wong）。在她逗留香港兩個月期間，聯同個別堂會展開「中學生福音聚會（ISCF Rally）」，其後，這些福音聚會由 GCF 接辦，而 GCF 特別成立了專責委員會關顧中學生的福音工作。除了福音聚會外，GCF 也為中學生舉行夏令會、訓練營，甚至在中學團契裡擔任導師、顧問，最後成立了中學生基督徒團契。

福音閱覽室的工作亦是在艾得理及 GCF 的推動下成立。當時他們認識到推廣優良基督教讀物的重要，於是在尖沙咀的德成街成立首間福音閱覽室。除了書籍借閱及售賣等服務外，不少福音活動及學生聚會亦是在閱覽室內舉行，閱覽室成為當時學生工作的重要基地。

1957 年夏天，崇基、浸會、新亞及港大的同學聯合舉行了一次夏令會，這可以說是「專上學生福音團契」(ICCF)的開端。其後各院校團契不斷互相探訪，並一同舉行夏令會及聯校福音聚會，而 ICCF 最後在 1963 年正式成立。另一方面，葛量鴻師範學院數十位基督徒同學，每天同心祈禱，立志將自己獻給主。他們畢業後當上教師，在教育崗位上努力傳福音，並組織教師聚會彼此激勵。1960 年在 FES 首位全職同工陳喜謙協助下，教師聚會改組成爲「基督徒教師團契」(TCF)，推動基督徒老師在崗位上見證耶穌基督。

隨著各項事工的擴展，不同的團契覺得需要更密切的合作。於是，各團契派出代表一同禱告及研究，最後在 1961 年 10 月成立「香港基督徒學生團契」(FES)。「基督徒護士團契」(NCF)則成立於 1960 年，並在 1968 年初加入 FES。

六十年代的社會發展與學生福音事工(1961 至 1970)

五十至六十年代，隨著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及韓戰爆發，大批移民由內地湧入香港，使香港社會產生重大變化。由於難民湧入，港府與教會及其他志願團體合作，大力發展社會福利及教育事業，而學校就成為教會的一個廣大禾場。

另一方面，隨著國內難民遷入，1949 年以前國內如火如荼的學生福音運動，亦乘時注入香港教會。其時國內學生福音運動是以培靈及佈道為主，有很濃厚基要派的味道，隨著教育的迅速發展，加上艾得理牧師的推動，掀起了當時學界一片澎湃的傳福音熱潮。FES 當時透過夏令會、大型的佈道會、小組等，引領不少學生信主；而當時的講師、學生、老師及畢業生亦自發參與。這均為日後學生福音運動的發展奠下基礎。

六十年代是學生福音運動的發展及鞏固期。教會承接五十年代的佈道熱忱，積極投身辦學事工，藉教育事業貢獻社會及傳揚福音。此時，FES 仍然延續五十年代的路線，側重於直接傳福音的工作，透過組織學生佈道會，帶領不少青年學生信主。由於 FES 是一個沒有宗派背景的機構，較少受傳統的限制，因此可以更自由及更有活力地探索新穎的傳福音概念及模式，例如福音營、福音性研經、友誼佈道等。另外，FES 亦開始提倡在佈道活動中安插民歌、土風舞、茶聚、旅行等青年學生喜愛的活動。按當時普遍嚴肅保守的教會氣氛而言，如此安排可算突破。

五、六十年代的教會，比較忽略有系統的研經及解經教導。當時教會受基要主義影響，在取向上有點反智，但當時 FES 則剛剛相反，相當積極推動歸納式研經、小組研經及研經組長訓練，鼓勵學生深入研讀聖經。除了推動查經，亦強調信仰的理性基礎，幫助學生面對信仰挑戰，特別透過推廣屬靈書籍閱讀運動，推介西方及中國基督徒著作，對裝備學生建立穩實的信仰理性基礎，功不可沒。

七十年代傳福音與關中關社(1971 至 1980)

六六年開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所標榜的民族主義及理想主義，加上中國的乒乓外交和後來進入聯合國，還有七零年代初的保釣運動，不斷衝擊著香港青

年的民族感情，新中國成爲香港青年人的認同對象，大專校園興起了「認中關社」的熱潮。基督徒學生當時面對越來越多質詢，於是開始認真反省福音信仰對中國及香港社會的意義，並嘗試從理論層面回應馬列共產思想的挑戰。這些都是當時教會避而不談的課題，而 FES 同工則走在前線，與同學一起尋找出路，在過程中孕育出不同事工，有以文字回應，有著重探討向大陸傳福音實踐，而各大專院校亦紛紛成立「主愛中華」祈禱小組。

早於以西方福音派教會爲主導的 1974 年洛桑會議，FES 已提出全人福音的重要，鼓勵學生於推行佈道工作的同時，亦提醒他們對人應有的關心及尊重。一些結合服務及宣教的行動模式逐漸於七十年代出現，例如九龍灣安置區的康健中心及鄉鎮福音工作。此外，FES 同工更與學生一起思想如何回應社會事件，例如金禧事件、艇戶事件等，更催化基督教團體發表聯合聲明的行動模式。

「突破」運動亦是在這股「福音與關社」的氣氛底下誕生。當時一群畢業生爲了回應青年人的需要，在 1973 年創辦了《突破》雜誌，而「突破運動」的其他組成部份，亦相繼成立，期望藉著文字及大眾傳媒，表達基督徒的價值觀，挑戰青年人重建人生的方向。「突破運動」是 FES 與本地及海外畢業生攜手承擔社會文化使命的重要一頁，象徵著 FES 在福音見證上另一個層次的發展。

在這段時期，FES 亦大力在學界推動宣教使命實踐，包括海外宣教及本地工場。乘著 1973 年 IFES 舉行的「東亞區學生宣教大會」，當中不少參與的香港學生，於會後在所屬院校內成立宣教關懷小組，引發 FES 與一些本地差傳機構合作，舉行宣教營，加深同學對海外宣教的認識；此外，FES 亦籌辦了一些短期海外宣教學習團，讓同學到東南亞地區觀察、體驗及學習宣教的工作。

本地事工則以鄉鎮佈道，及暑期全職實習計劃最爲突出，前者關懷日漸式微的新界鄉村，後者則投入社會的弱勢群體當中。

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與整全福音(1981 至 1989)

踏入八十年代，九七問題引起香港社會極大震盪，FES 率先組織聚會，發動信徒關注這個對香港和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契機。其後，FES 聯同多位教會領袖草擬了一份歷史性的《信念書》，向香港信徒提出在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應持守的共同信念。爲配合《信念書》的出現，FES 出版了一系列的時代性書籍及查經資料，亦舉行了一系列的跟進研習班，探討香港的轉變、教會更新、基督徒的承擔、代議政制、民主參政、國家觀、三自教會等，加深信徒對時局的認識，鼓勵他們繼續探索及投身。

除了關注九七的影響，FES 當時沒有忽略本地其他的問題，藉此而發動信徒對時局的關注，包括對香港政府修訂公安條例和政制檢討的取向。FES 如此關注時局發展，是相信生活與使命是不能分割的，要具體見證福音，就必須首先認識處境，從而活出信仰。

FES 確立以「使人作門徒」為事工核心，認定耶穌走到群眾當中，藉著宣講天國的福音、教導天國的道理，並醫治疾病的「三重職事」，在群眾中呼召人跟隨祂。福音工作不再單單局限於使人決志，而是使人跟隨主作門徒。至於福音活動，不單是傳遞一套救贖的概念，而是把福音直接引進受眾的生活當中，與他們一起面對時下影響他們的問題，探討福音對他們的意義，從而委身跟隨主。當時福音活動觸及過的主題有：家庭、學業、自我形象、同輩關係、戀愛、電視、電影、流行曲、選美等。

「使人作門徒」這核心信念，除了影響佈道模式，亦衍生了「門徒學習計劃」。FES 認為耶穌基督的門訓工作，是包括闊度與深度兩個層面。闊度層面如宣講、教導及醫治等，耶穌透過這些工作可以接觸到無數的群眾；但同時耶穌亦從眾多慕道者當中揀選一些門徒作深度栽培，使他們繼續承擔天國的使命，肩負使人作門徒的工作。

FES 當時亦採取類似的模式，一些大型的聚會例如「救東行動」、福音營、門徒訓練營等是普及的工作，而同工與中學生、大專生、畢業生、教師及義工等開設門徒學習小組則是深度層面的工作。門徒學習小組的內容主要包括三方面，分別是對神的委身、門徒的生活方式及使命的承擔。根據當時年報的記載，每年開設的小組約十數個，所接觸到的有百多人。這些小組不單造就了不少學生及畢業生的生命，亦為 FES 帶來一批有質素的義工，間接幫助事工的推行。

九十年代迎接回歸與時代使命承擔(1990 至 1997)

八九年中國爆發學運，同學對祖國的熱誠再次被挑起，不少基督徒同學會熱烈參與支持國內民運的行動，FES 同工更是全力以赴。FES 當時與突破合作，舉辦「中港青年一條心」集會，共有二十萬人參與。之後為了幫助同學面對中國民運事件，FES 一連舉行了三次「學運·學習」的講座，重點讓同學認識中國現況，並作出信仰的反省，講座後成立跟進小組。翌年十月，FES 再舉辦「信仰救國」的研討會，探討基督徒對國家的回應，目的亦是鼓勵同學認真關注中國，並思考如何裝備自己回應國家需要。

雖然當時 FES 舉辦了不少回應時局的活動，但同學的使命感卻未被引發出來。在八九民運過後，因著六四的慘痛回憶，加上中英港不安的形勢，不少學

生落入失落及迷惘中，對社關國難等感無力承擔；其次，不少同學亦發現自己內在生命枯乾及空洞，故此在九十年代初期，大專團契普遍注重內在生命的操練，希望在一些基本的屬靈操練中重新與神及人復和，建立關係。

當時大專同學花不少時間在安靜、祈禱、默想，並經常舉辦靜修營內省。此外，他們在這三年間舉辦了不少大型的聯校佈道會及夏令會，同學的反應亦相當熱烈。這段時期的同學大多傾向關心是自己內在的生命，除了對校園福音有一定承擔外，一般對時代使命的觸覺是明顯下降。但隨著九七臨近，情況逐漸有所轉變。

首先是重拾思想戰線，這可看成是對九十年初屬靈操練熱潮的反動。爲了幫助同學能重新建立信仰理性的基礎，以及回應思潮文化對信仰的挑戰，FES 舉辦了一系列的護教講座，每次的參與人數均達數百人。除了多次大型的公開講座外，亦曾連續數年，於暑假舉辦密集神學課程，與同學一起反省信仰與時代議題的關係。

其次則重申基督徒的使命承擔，尤其培養同學對時代感召的回應能力。一方面對提升同學對香港本土的關懷，另一方面則迎接九七回歸中國。本地的關懷主要集中關注色情文化的工作，包括成立「基督徒關注色情文化小組」，組織行動，以喚起社會各界對這個課題的關注，而此小組最後衍生了現時的明光社。

至於迎接九七回歸中國，FES 積極幫助學生作好準備，承擔回歸後的挑戰，包括一連串大型講座及集會、舉辦「中國節」、並自 1994 年起，每年暑假均舉辦「中國行」，讓同學親身體驗並了解國內的情況，而院校團契內亦紛紛設立「關中」小組，迎接「中國人」這身份的新體會和詮釋。

結語

走過四十多年歲月，不難看見 FES 在不同年代回應時代的召喚，實踐使命於當下的生命氣質。在神學反省方面，由早期注重直接佈道，到八十年代的整全福音，以至九十年代的使命承擔，均力求真誠活出信仰，不單停留於理性反省，亦看重信仰實踐。

基本上，不少香港教會領袖均認同 FES 四十多年來，不單培育出一代一代的信徒領袖，對整體教會的發展路向亦有正面和重要的貢獻，尤其在回應時代，關心社會，活出整全福音方面，有其先行者的作用。

全文完